

忆当年

追溯到1980年，“春运”一词第一次出现在《人民日报》上，它是对改革开放以来，务工、求学等人员流动性增大的客观反映。

春运的记忆，是中国人所特有的。这份记忆是有味道的，它是方便面、“闷罐车”的滋味；这份记忆是有容貌的，它是绿皮火车、蛇皮袋的样子；这份记忆还是有情绪的，它是焦灼的，伤感的，困惑的，更是温暖的。

本期《忆当年》，我们将镜头对准老一辈的春运记忆，从他们的故事里寻找勇气、获取力量、感受温暖。



2004年1月25日，湘潭火车站迎来客流高峰。(本报记者 陈旭东 摄)



2006年2月，春节后的返程高峰，乘客们在汽车西站排起长龙。(本报记者 陈旭东 摄)

XX ⇌ 湘潭

我的春运记忆

长途汽车站里的春运记忆

本报记者 谭涛

时间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
人物：莫崇奇

车站是一座城市的“客厅”，它日复一日地迎接着游子或者来客，见证着普通人的离别与欢聚。莫崇奇从湘潭长途汽车站退休已近10年，但怀旧的他每到春运期间都要回站里看看，遇到工作人员忙的时候就帮忙打下手。

“每到春节，前往北京、上海、福建、广州等热门城市的汽车都是座无虚席，有时候甚至还要‘加塞’，司机们更是连轴转，春运整整40天都没有假期，但是这一个多月的工资也会高出很多。”说起过去的春运，莫崇奇滔滔不绝。莫崇奇还记得有一次大年三十晚上，有个人买了票要回湘潭县花石镇过年，但是时间太晚已经没有了大巴车了，于是他开着单位的轿车将他送回家。

人多自然事情也多。莫崇奇告诉我们，他当时是从公安系统派驻到汽车站的，他所在的部门叫作市公安局汽车站派出所。之所以要在汽车站设立专门的派出所，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汽车站很乱。一方面是当时的乘客安全意识不高，他们经常能在一些人的行李中搜出雷管等违禁物品。

过去没有智能检测机器，所以莫崇奇他们要将乘客的包一个个打开检查，平常人少他们勉强还能应付，但是春运旅客呈几何式增长，他们双手难敌众拳，车站派出所几个人根本忙不过来。因此，每每到春运，武警部队都会派出一个排的人帮莫崇奇他们检查三品(易燃品、易爆品、毒害品)，因此当时的汽车站也成了警民共建单位。

“我们在进站口设两个检查通道，没有违禁物品才能进站买票，正是通过这种原始的方式进行把关，才保障了客运车辆运输途中的安全。”莫崇奇说，每次春运过后，他们没收的违禁品能堆满一间屋子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末，汽车站内扒窃现象常见，尤其到了春运人来人往的时候，小偷更是猖獗。经过多年的反扒工作，莫崇奇练就了通过肉眼识别小偷的能力，只需要看一下对方的眼神，就知道谁有可能是小偷。

1988年2月，有一次在前往株洲的大巴车上，莫崇奇看到一个乘客眼神飘忽不定，于是他们全程格外关注这个人。果不其然，等到有人下车的时候，这个人顺势偷了一位乘客的钱包，为此莫崇奇准备等小偷下车后立将其抓获。没想到小偷竟觉出不对劲，下车后开始狂奔，最终追了1个多小时，才将小偷抓获。随后，莫崇奇一行来到小偷的住处，但是发现房子内空空荡荡，什么摆件都没有。这时，莫崇奇发现床上的席子有异样，没想到他们一掀起席子，10元的钞票犹如落叶洒满一地。经清点，钞票总值达到10000多元，后来这位小偷还被大家戏称为“湘运大亨”。

莫崇奇告诉我们，每年春节期间，莫崇奇和同事们几乎都不能休息，经常要工作到深夜。在湘潭长途汽车站工作的20多年里，莫崇奇都没有回过家乡老家陪父母过春节，走亲戚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，随着社会治安的整体提升，汽车站内的扒手逐渐减少，直至基本消失。但是在过去那个简陋的年代，正是许多如莫崇奇这样平凡的人，用青春和汗水守护了大家的出行安全。

时间：1988年2月10日
人物：张铁强

晚上8点，离张铁强的列车发车时间还有两个小时，候车室里就已经排起了长队。突然有几个人从密密麻麻的队伍中挤到了前方，伺机插队。张铁强看了他们一眼，双手再次抓紧了前面兄弟的衣袖，干脆把整个前胸贴在了人家的背后。大家都是这么做的，至于前后是男是女、是老是少，姑且不论。

1987年，张铁强和73个湘潭兄弟组成了一支装修队，一起来到新疆乌鲁木齐搞建设。要过年了，装修队派出5个人背着枕头铺盖，在开票前夜直奔火车站售票厅蹲守，这才买齐了74张2月8日从新疆到郑州，再从郑州到长沙的火车票。

2月8日那天，火车正点来了。随着火车滑过站台，候车室里涌出一大群人，带着视死如归的气势向尚在移动的一节节车厢冲去。火车刚停稳，车门旁就已是黑压压的人头，许多人就转而向窗户奔去。张铁强一行人的行李又多又大，只能眼着别人或摩肩接踵地从车厢门挤进去，或从半扇窗户中爬进去，直到火车缓缓开走。

2月9日，剩下的人只得买了站台票，先进站再说。这次，队伍里有10多个人好歹挤上了火车，却因车上的人实在是太多，两个车厢间的弹簧已被死死压住，车都开不了。万般无奈，列

上车 / 上车

本报记者 郑慧子

车员只得高声喊着劝部分旅客下车，但显然无人响应。为了列车可以正常运行，列车员开始随机往车下扔行李，行李下去了，人才跟着下去。经过这一拨，张铁强所在的装修队还剩下60个人滞留原地。

想起前两天“战斗”的惨烈，张铁强只能苦笑。

深夜10点，张铁强一行人要乘坐的列车即将进站。他们站在黑暗的站台上，背着旅行包，提着装修工具，在寒风中等待火车。疲倦、饥饿、寒冷都在其次，挤不挤得上几分钟后开来的火车才是最焦心的。

远远的，一束昏黄的光伴随着汽笛声冲向人群。张铁强一行见状，迅

速两两一组组成一个长方形方阵，每个人都从工具袋里拿出了吃饭的家伙——砌墙刀，用外侧的手紧紧抓着扬了起来：“别过来！让我们上车！我们实在没办法啦！”张铁强和同伴们用湘潭方言一边大声喊着，一边快速朝缓缓停下的列车门靠近。人群也许并没听懂他们喊着什么，但看见砌墙刀，还是退开了一条道，保持着30厘米左右的距离围着这个方阵向列车靠近。

张铁强等人或快步往前冲，或碎步退后，这一次，总算是齐齐整整上了车，有一半人还占到了座位。

很快，车厢里便人满为患，连厕所里都是人，动都动不了。张铁强坐在窗边的位置，正想开开窗透透气。结果刚打开窗，一个黑色布包便“嗖”地飞进来，把刚摆上茶几的方便面砸翻在地。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，一个头戴皮帽的旅客已经敏捷地钻进了车窗，踩着他用布包开辟的道路跳到地板上，对朝他怒目而视的方便面主人道声“包涵”，便从容找位置去了。这位旅客到站太晚，车门已关，见开着一扇车窗，便果断地扒窗。想想他为了不误车冒着生命危险，别人也不好生气了。

窗外的景色变换越来越快，来自天南海北不相识的旅客就座几分钟后即称兄道弟、海阔天空了，整个车厢内充满浓浓的烟火气息，张铁强也在这个氛围里，暂时将从郑州转长沙的忧虑抛诸脑后了。

“闷罐车”里的年轻人

本报记者 冯叶

时间：1990年春节前夕
人物：王金菊

公交车路过越秀公园时，18岁的王金菊才发现公园门口已经摆放好了“喜迎新春”的花卉盆栽，这让她回家的心情更迫切了。下一站就是广州火车站了，王金菊和车上的八九名老乡已经开始清点行李，为下车做准备。

王金菊和她的同伴们都是湘潭锰矿人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锰矿劳动服务公司开始组织矿里职工分批去广州务工。当时，沿海经济刚刚发展起来，需要大批劳务人员，开出的工资也高，在锰矿普通职工平均工资才100元/月的时候，去广州务工每月可赚到几百元甚至几千元。王金菊报了名，并在1989年赶上了第二批南下的务工队伍，进了广州一家玩具厂，按件计酬拿薪水。要说一年来的收获，王金菊还真不小：最多的一个月拿了2000多元，最少的一个月也有几百元。为了多赚一些，她一直工作到小年之后，才和同伴去赶春运的火车。

一到火车站，几个人就分好了工。王金菊和两个年龄小的女孩负责看守全部人的行李，其他人则去排队买票。等待一个多小时后，前方传回的消息却是所有火车票已售完，只好买了“棚代客”的临时列车。

什么叫“棚代客”？王金菊是上车后才知道的。

“棚代客”列车就是原来用来拉货的火车，车厢内没有座位、没有窗户、没有电灯，好几节车厢共有个临时搭建的厕所。白天太阳照射时，车内十分闷热如同桑拿，夜晚气温骤降寒气逼人，所以也被人称作“闷罐车”。

王金菊看到这一景象，第一反应是跳下火车，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进了车站厕所。再回到车厢时，她已经连站的地方都难寻了。她只得以一个别扭的姿势挤在人群中，忍受着空气里的臭味，再在火车行进过程中一点点腾挪，才站直了身体。

同车厢的人，大多和王金菊一样，是改革开放后率先到广州务工的一批年轻人，其中又以湖南人居多。上世纪80年代，大批农民工从全国各地进入广州务工，京广线的运输压力陡增，于是1984年起，原铁道部采取“停短开长”“停货保客”“增开临客”等方式缓解压力，而增开的临客车，几乎清一色是“闷罐车”。

这些怀着“改变人生命运”梦想的年轻人，挤在这个黑漆漆的车厢里，不知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，也不知道列车到了何地。他们大多数人保持沉默，这是陌生人之间的安全模式，也是疏解车厢内烦躁情绪的有效方法。

王金菊隔着衣服摸了摸缝在里裤上的口袋，确认了随身携带的2000多元钱还在，拿出事先准备的方便面和嘉士利饼干来填饱肚子，因为没想到会买不到绿皮火车票，方便面顿时成了“干脆面”。突然，列车一阵晃动，王金菊的“干脆面”洒了一身。紧接着，列车停了下来，车门被打开，列车员通知大家：列车出现故障，需要紧急抢修，请大家下车等候。

王金菊带着行李下了车。一行人找了块铁轨旁的空地，在京广线沿线的某个城镇，大家拿出了扑克牌，找到了一家有热水的商店，泡上了热腾腾的方便面。

这一次抢修，不知花了几个小时。可这些年轻人的心态却异常轻松，车厢里沉默着的大家，在阳光下，开始自由地攀谈，不着急，也不害怕，因为他们都知道，列车迟早会修好，他们迟早要回家。而不久的将来，他们都是镇上的、村上的首批万元户，如同这次难忘的春运旅程一般——苦尽甘来。

冰雪列车

本报记者 冯叶

时间：2008年1月29日
人物：李德东

“留下吧，深圳也是你的家！”……广播在深圳火车站的上空密集地响起，试图劝离不断向候车室方向涌动的人群。显然，广播收效甚微，人们都有备而来。

李德东在来火车站的出租车上就听到了这句温情的号召，可这会儿他还是出现在了火车站东广场上。他看了一眼表：2008年1月29日上午8时44分，离他的列车发车时间还有12个小时，离大年三十还有8天。

虽然一个月前已买好火车票，虽然是在10摄氏度的深圳，李德东仍然感受到了寒意逼人，心跳加速，新闻铺天盖地袭来，他慌了：“南方遭遇50年以来最严重的冰灾”“电力中断、通讯中断、道岔封冻”“京广线、京九线受灾严重”……李德东的家乡湖南是受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，深圳开往湖南方向的列车几乎全部停运。

一小时、两小时……队伍从一动不动，到龟速移动。到了第7个小时，李德东才从临时安置点的队尾排到队中。直到当晚11点多，车站工作人员呼喊的车次号，让李德东从瞌睡中一惊，他一手举着票、一手抱着胸前的背包，一路从进站口被人群推搡着，带到了火车上。

列车从站台上呼啸而过，隐没在身后的，是李德东打拼了4年的深圳，以及仍然滞留车站的近10万异乡人。

幸运的李德东不仅上了车，还找到了一个安身处，身材魁梧的他，半边屁股落了座。许是心头大石终于放下了，又或是火车速度异常慢，让他困意袭来，挤在人群中他很快就打起盹来，再惊醒时，列车已驶向韶关站月台。

他眯着眼往窗外瞧，这才见到了冰灾的真相。

大雪覆盖了一切，天地相接处已不分明。只是月台上等待的旅客托出了列车的行进轨迹。火车还未停稳，远处一群黑乎乎的人影向列车奔跑而来，他们担着水桶、簸箕、热水壶，一路吆喝着，车上的人才发现，是来卖方便面、茶叶蛋和热水的当地村民。

“方便面30元一桶，热水10元钱一杯……”2008年，方便面的零售价是3.5元左右，旅客们一边大声抱怨，一边掏钱，掏慢了还抢不到。为了维持秩序，无法正常通行的列车送餐员跨下列车，沿窗叫卖，虽未涨价，安抚了人心，可物资远远不够，很快也被抢购一空。

这场冰灾来得太突然，当时的人们还未准备好，一场大考就从天而降，既考能力，也考人心。

李德东在这场考试里，考出了坐公交车的心情：列车速度慢不说，逢站

必停，开窗太冷，关窗又太闷。列车广播里不时传来前方紧急抢修的消息，归期难定，旅客们的情绪从最开始的庆幸，到后来的焦躁、愤怒，直至归于理性。

在那个充电宝还未普及的年代，素不相识的旅客们开始商量着轮流关机，以节省电量。每个人的电话都成了公用电话，随身携带的零钱成了共同财产。李德东正处壮年，坐了两个小时后将座位让给了一位妇女；旁边的女大学生钱不够了，邻座拿出了20元钱；还有一些初次见面的年轻男女，互留了联系方式。

从韶关离开10个小时后，风雪才卷着列车到达郴州。这里是南岭山脉以北，冷空气遇山折回，全堵在了以产煤闻名的郴州，李德东再也不用担心像往年一样，钻一鼻子煤灰。大雪覆盖了煤矿，也压弯了电缆，列车每往前重新挪动，就能见着铁路抢修人员匆匆退开。

直到列车驶过南岭隧道，一切豁然开朗起来。南岭南边没有了大雪覆盖的痕迹，列车的速度也明显快了起来。

啵啵，啵啵，啵啵……26个小时后，列车到达湘潭站。李德东迫切地下车、坐上一辆的士、回到板塘铺的家中。和妻子拥抱的那一瞬间，那一年的风雪，和列车上的陌生人，全都消融在了夜色里。